

DOI: 10.19361/j.er.2023.03.04

# 中国与世界反贫困 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历史比较研究

宋洪远 江帆\*

**摘要:**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减贫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系统梳理了两百多年来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理论的演变过程及其减贫政策实践,回顾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减贫政策实践。研究得出: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道路上存在明显区别,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不同的反贫困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和政策实践的不足与缺陷,探究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和行动对实现持续稳定减贫的意义与作用,并对中国特色扶贫减贫的经验和启示进行了总结提炼,为世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 以资本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反贫困实践经验;反贫困理论

**中图分类号:** F323.8

## 一、引言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贫困问题是人类长期面临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消除贫困是实现现代化的跨时代难题。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得以从宗教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在经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率先走上现代化之路。但是现代化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单轨车道”,受外来刺激和内生需要的双重影响,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自主性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更是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断重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并存关系,不同社会制度作用于反贫困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不同的反贫困理念和减贫道路。

反贫困的思想和主张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反贫困政策的作用在于稳定社会秩

\* 宋洪远,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邮政编码:430070,电子信箱:jing1202@sohu.com;江帆,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信箱:1015008708@qq.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脱贫攻坚精神研究”(批准号:20@ZH006)的资助。

序,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18世纪以后兴起的两次贫困启蒙运动<sup>①</sup>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贫困问题越来越受重视,解决贫困问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执政的主要目标。从英国的“济贫法”到美国的“向贫困宣战计划”,从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到世界银行的反贫困报告,世界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机构实施的一系列反贫困行动,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世界减贫脱贫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在贫困理论方面,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论”等,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进行了理论阐释。舒尔茨(1987)认为,人力资本、农业发展对解决贫困问题具有重要作用;阿玛蒂亚·森(2001)提出的权利贫困理论将“权利失败”视为可能产生贫困或饥荒的重要原因;Deaton(2003)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考虑贫困问题,探讨了贫困国家的消费特征以及贫困的决定因素。国外学者提出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主张在特定时期得到了验证,并在非洲等贫困地区进行了实践应用。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分析较为缺乏;多数研究对贫困原因的分析未触及制度性根源,提出的反贫困政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发展失衡等因素影响,中国长期饱受贫困问题困扰;贫困人口规模大、地区分布广、贫困程度深等问题,又大大加剧了中国贫困治理的难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反贫困进程中不断推动反贫困理论的创新与减贫实践的发展。从扶贫理论看,中国在继承唯物史观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目标升级、思路创新、动力增添、力量强化、体制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特色反贫困理论(唐正东,2021)。从减贫路径看,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陈济冬等,2020)。从扶贫措施看,党建扶贫机制、官员治理能力、农民增能赋权、产业帮扶、易地搬迁、数字普惠金融等,都有助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人口(李雨等,2019;涂圣伟,2020;文雁兵等,2020;高帅等,2020;杨灿明,2021;彭澎、徐志刚,2021)。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的减贫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数研究主要是对具体的减贫实践与政策措施进行分析,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减贫道路大历史观的研究较为缺乏,未能提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人类减贫的历史进程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减贫实践看,中国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色减贫道路。如何对中国的减贫理念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阐释,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二分法”分析框架,通过对比分析强化对贫困问题本质的理解,进而彰显中国反贫困行动的内在价值。本文除引言外,第二部分通过系统梳理两百多年来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理论的演化过程及其减贫政策实践,论证“以资本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和政策实践的不足和缺陷;第三部分通过回顾

<sup>①</sup>两次贫困启蒙运动的划分由马丁·拉瓦雷确定。

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减贫政策实践,探究“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念和行动对实现持续稳定减贫的意义和作用;结语部分概括“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不同模式的内涵和特征,总结提炼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经验 and 启示。

## 二、世界主要国家的减贫理论和政策实践

### (一) 早期的反贫困思想和主张

在古代,贫困被认为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为避免大规模饥荒导致民众发生暴乱进而威胁政权稳定,执政者重点关注短期的贫困问题。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分配正义”、“机会平等”、“自由权利”等思想,表现出了较强的反贫困意识。其坚信“自由秩序”有诸多好处,但认为“世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sup>①</sup>,认同奴隶制的存在。古印度哲学家考底利耶提出的“建立在国家直接控制下的土地国有制村落”的设想和“通过政府资助公共工程计划提供就业,解决外部冲击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建议(Boesche, 2002),对减缓贫困问题、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6世纪至18世纪,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得重商主义思想盛行。早期重商主义者通过对海外贸易积累大量财富的经验总结,将流通领域中的商业贸易活动视为财富的源泉,认为一国贸易收益的增加必须以至少一个其他国家收益的减少为代价。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贫困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重商主义者看来,饥饿会促使穷人努力工作,贫困是激励工人积极劳动并保持低工资的关键。

随着失业工人和乞丐数量的不断增长,欧洲的贫困率急剧上升。为巩固统治地位、确保政权稳定,一些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政策逐渐形成。17世纪中叶,具有浓重重商主义色彩的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可以通过公共福利工程缓解贫困人口日益增加的问题。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贫困由不良行为造成,是一种道德惩罚(配第, 2011)。为了纠正穷人的不良行为、改造穷人性格并限制他们反抗的能力,英国实施了由公共部门提供、地方资助的转移支付制度——《伊丽莎白济贫法》(也称旧济贫法),公共资助的济贫院也开始出现。

早期的反贫困思想和主张带有很强的阶级性,缓解贫困的目的基本局限于应对导致政治不稳定的短期根源,实质是为了确保政权稳定、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重商主义的兴起对当时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在特权、垄断、国家干涉等方面与封建主义存在共性,并在政策推行上与封建王朝存在密切关系(陈岱孙, 2014),贬低了市场竞争机制,导致出现“贫困化增长”趋势,收入分配差距加大。重商主义者从商人立场考察剥削劳动的商业资本运动,极端重视资本的重要性,基本忽视了对人的关注,人本主义、民生主义等思想和意识极为薄弱,轻视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益和人的发展,压低工资成为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选择。

### (二) 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

18、19世纪,世界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现代化的制度改革和新技术的应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分配冲突日趋严重,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突出。由于商人资本

<sup>①</sup>亚里士多德,1997:《政治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13页。

的发展“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sup>①</sup>,加之在欧洲封建制度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并得到一定发展,新的哲学和经济思想出现,为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开辟了道路。针对重商主义将长期贫困视作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必然产物,低工资导致的贫困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一观点,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驳斥。亚当·斯密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言人,为支持大工业的发展,保证产业资本在生产中的完全统治,通过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同干涉主义政策进行了斗争(陈岱孙,2014)。他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实现自由贸易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提高工人实际工资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斯密,2016)。卢梭(1962)认为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并非事物的自然秩序;康德主张对穷人采取更加尊重的态度,认为应由国家而不是私人慈善机构承担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责任(弗莱施哈克尔,2010)。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就此展开。

随着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的逐步推进,一些反贫困政策理念开始出现。美国思想家潘恩(2013)主张征收土地税以支付统一红利;英国经济学家边沁(2009)将社会选择建立在其对个人效用的影响上,提倡对低于临界“生存”水平的所有收入免征所得税。政府也开始采取相应的反贫困政策,如欧洲和北美对大城市中的贫民、乞丐等“值得救助”的穷人实施“贫困救济”;英国的旧济贫法要求每个教区承担解决贫困问题的义务,利用地方财产税帮助诸如老年寡妇、残疾人士等无法工作的人。

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使得社会日益分裂成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旧济贫法强迫失地农民变成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加剧了工人对资本的附庸,工人成为机器单纯的附属品,并“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sup>②</sup>。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总规律及其内在逻辑的观点看,机器对人力的根本替换使得生产性就业大批减少成为必然(曼德尔,1998),这也就使得部分在业工人被排挤沦为失业者,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产生。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存在周期性,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其不仅适应了资本积累的要求,提供了随时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而且给资本家提供了威胁在业工人的手段,迫使他们提高劳动强度,接受较低的工资待遇。

产业革命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阶段(工场手工业)向第三阶段(机器大工业)的过渡,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完全统治。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贫困化现象日益突出,频繁的工人运动、武装起义等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关注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这一时期通行的减贫举措仍遵循旧济贫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救济资金主要来源于对地主征收的地方税。由于单一的贫困救济“不能使穷人变富,却能使富人变穷”,引起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同时,国家财政和慈善事业由于缺乏资金也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旧济贫法难以为继。

马尔萨斯从“人口论”角度系统研究了贫困问题。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和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不同,人口的增长会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马尔萨

①卡尔·马克思,1975:《资本论(第三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3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07页。

斯,2008)。旧济贫法对穷人的救济会导致早婚和高生育率,进而使人口增加,但却不能增加养活人口的生存资料;同时,他们所消费的食品却会使本应由更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享有的食品份额减少,因而迫使更多的人成为被救济的对象(拉瓦雷,2021)。马尔萨斯认为,应该取消户外救济,让极端贫苦的人去往济贫院,并强迫他们工作。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英国旧济贫法的调整和改革。1832年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改革中的胜利更是为制定和执行新的济贫政策提供了条件。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也称新济贫法),取消了斯宾汉姆兰制度<sup>①</sup>,在大幅削减支出的同时,对受救济者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必须是被收容在济贫院中从事苦役的贫民。新济贫法缩小了对穷人救济的覆盖范围,将受益者限制在济贫院内,穷人被视为“囚犯”。

马克思批判了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规律,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伴随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使资本总额中可变资本的数量相对或者绝对减少,造成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或者绝对减少;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即“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sup>②</sup>。马克思还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将工资率保持在一个固定的“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观点和贫困是某种自然状态的说法,认为从劳动者个人身上去探寻社会普遍贫困、简单地将贫困归因于穷人的愚昧无知并不合理。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对贫困问题的措施不具有实质性的效果。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在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贫困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修订法律、发展慈善事业等方式治理贫困,会导致穷人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新济贫法名义上是对穷人的救济,实际上是迫使穷人完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进而使得赤贫“纪律化”、“永久化”(郑继承,2020)。

恩格斯也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新济贫法,认为其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手段,“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它“实质上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sup>③</sup>由于新济贫法存在高度的不正义性,激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英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被渐渐唤醒,推动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从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看,18、19世纪,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已开始用经济学框架考察贫困问题,对重商主义进行了驳斥和发展,并以自由主义观点解释了资产阶级产业革命以来贫困问题出现的合理性。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而忽视了人的重要性,认为穷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能力方面的缺陷,是市场法则的必然结果(黄承伟等,2017)。从核心与实质看,改良主义缓解贫困压力的主张和实践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秩序,未能从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出发。由于对贫困本质

<sup>①</sup>斯宾汉姆兰制度是18世纪末英国一种院外救济形式的济贫制度,该制度为工资补贴制度,主要内容是将一定重量的面包价格与家庭规模作为补贴的主要标准。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727-728页。

<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88页。

的认识存在偏差,古典经济学派错误地以手段替代目的,提出的为生产而生产这种无限追求财富的理论和由之而引导出的政策,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

### (三) 第二次贫困启蒙运动

在第一次贫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精英阶层逐渐形成对勤劳但贫困群体的一种“情感认同”,为第二次贫困启蒙运动提供了道德基础和思想来源。20世纪中叶,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独立,全世界开始了对新自由的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使得各个国家经济政治重新洗牌,建立全球性的价值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贫困问题则成为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媒介。这一时期,全球的极端贫困发生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与反贫困相关的经济和哲学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并推动了第二次贫困启蒙运动的发展。

在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理念的影响下,对整体富裕的认知使得人们更加强烈地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消除贫困,工业化国家社会性支出大幅增加,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环境恶化,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越战更是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阶级矛盾,国家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为维护社会稳定,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困宣战计划”,将重点放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内容涵盖营养、卫生、教育、住房、培训和各种社区倡议。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家庭援助计划”,向低于一定收入的群体提供统一支付。这一时期,美国反贫困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认为“值得救助的”穷人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之间、“失业的”穷人和“有工作的”穷人之间并无区别,凡是穷人都有资格获得救助(拉瓦雷,2021)。但是里根在执政期间,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认为政府救济并非减贫的最好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进而使穷人受益。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里根政府各项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削减。

在第二次启蒙运动发展过程中,贫困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观点被推翻,贫困问题被视为必须彻底根除的问题。经济学家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要转变,经济增长不再被视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合理的增长作为一种减贫手段被纳入经济改革计划。权利贫困、人力资本、再分配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极大丰富了贫困理论的内涵,人的权利和发展问题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外在制度对减贫的重要性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是,经济学家仍然忽视了贫困的本质问题,提出的相关政策主张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其未能意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sup>①</sup>。

### (四) 二战后一些国家的减贫实践

两次贫困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全球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国家经济增长成为反贫困的重点,消除贫困成为全球性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和对发展重要性认识的提升,反贫困国际化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在全球贸易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一些针对解决贫困问题的国际机构开始出现。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37页。

作为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之一,联合国在人类发展问题上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其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印发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消除贫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之一,世界银行提出了贫困线的参考标准,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和技术援助来帮助其推行反贫困政策,以减少世界贫困的发生。

在国际机构的引领和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并采用不同的贫困标准。发达国家主要采用相对贫困指标,比如,欧盟基于收入角度的相对贫困标准确定贫困线,将国家人均收入的60%作为贫困标准;日本的贫困线为全国居民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0%;美国按照家庭人数和收入确定贫困线,人口数不同的家庭,贫困标准不同。发展中国家则多采用绝对贫困指标,比如,巴西的贫困线为最低工资的1/2,绝对贫困线为最低工资的1/4;埃及将收入低于全国人均支出的1/3视为绝对贫困,低于2/3视为相对贫困;印度的贫困线与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接近(拉瓦雷,2021)。

世界一些国家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减贫进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前后,巴西通过改革实现了经济的适度增长,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巴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从经济增长模式看,巴西服务业的增长在减贫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服务业增长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西减贫进程。20世纪中叶以后,印度通过实施粮食补贴、农业投入补贴、补贴信贷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的发生,但由于多数农户无力承担肥料和机械化的费用,只能将土地所有权出卖给富裕的农民,这直接导致印度无地农民数量从1951年的2790万人增至20世纪90年代的5000万人(博杜安,2015)。与此同时,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在扩大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的同时,受世界经济震荡的影响程度也随之加深,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导致的贸易不平衡又推高了印度的贫困发生率。

针对独立主权国家经济明显落后以及对西方发达国家依附的现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战后的全球格局决定了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时,必须将其纳入全球体系进行考量,由此产生了“依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势力……落后的地区总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分离的腹地”<sup>①</sup>。巴兰指出,发达国家垄断大企业通过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并榨取经济剩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经济根源。阿明(2008)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不平等关系,使得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约,高剩余价值率、相同的生产率和世界规模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决定了价值从外围向中心转移,中心的发展造成了外围的不发展,并使得外围依附于中心(李晓红,2015)。

“依附理论”对全球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尖锐化的现象做出了解释。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经济体系下,一国的经济波动易造成全世界的连锁反应,引发其他地区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激增。资本主义国家利用

<sup>①</sup>保罗·巴兰,2000:《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第12页。

对世界秩序和规则的垄断,通过资本扩张不断拓宽资本增值空间,使得全球收入两极化程度不断加深、不平等现象日益恶化。

### 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和减贫政策实践

####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主张

贫困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贫困问题更早受到思想家的关注。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体现了对财富分配均平的理想追求;《周易》中记载“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体现了均富济贫的美好情操;《管子》中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体现了对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的正确认识,为中国反贫困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儒家仁政、大同思想,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等的影响下,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等优良传统逐渐形成,国家也一直重视济贫政策的实施。周朝就有政府救济灾民的记载,例如,《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记有“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汉朝政府建立“常平仓”制度,隋朝设立“义仓”,唐朝出现了具有一定可持续性的救助机构“悲田养病坊”,宋朝出现了义庄、义田、义塾等多种宗族慈善形式,宋元时期设立“广惠仓”并建立了专门性的丧葬类慈善机构“漏泽园”,清朝设立“义田”(吕洪业,2014),这些济贫政策和实践对扶贫减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在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上与古代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差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君舟民水”等思想的核心观念为“民本”,强调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惠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等思想要求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要顺民意、重民生。这些是与当代中国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相契合的。

#### (二)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过程

在一百多年来的减贫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分析中国贫困特点和减贫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共同富裕的反贫困逻辑,不断丰富反贫困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创立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sup>①</sup>,必须坚持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才能取得反贫困运动的胜利。这一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着力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和农村经济一片凋敝,亿万民众处于贫困甚至赤贫状态。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状态,毛泽东同志指出,“现今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由已经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造成的”<sup>②</sup>,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sup>③</sup>。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的运

①马克思、恩格斯,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13页。

②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17页。

③毛泽东,197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403页。

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①</sup>这一观点,毛泽东同志于1944年将其创造性地概括为“为人民服务”,并将其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针对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绝大多数农民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的社会现实,毛泽东同志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sup>②</sup>,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sup>③</sup>,提出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消除贫困产生的制度性根源(任东景,202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贫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指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路径,明确了消除贫困的奋斗目标,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的严峻形势,邓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sup>④</sup>,“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⑤</sup>,提出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贫困人口向西部及偏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地区集中,贫困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江泽民同志提出,“扶贫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全党和全国的共同任务”<sup>⑥</sup>,“要首先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全面推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项工作,必须同我们对下个世纪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结合起来,同加快中西部地区建设、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sup>⑦</sup>。进入21世纪,为进一步解决贫困问题、巩固温饱实现小康,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主战场……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sup>⑧</sup>;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长期而艰巨的任务”<sup>⑨</sup>。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认识,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反贫困的思想,在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历史任务、战略部署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关键阶段;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贫困形势,减贫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

①马克思、恩格斯,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第42页。

②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第1页。

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十四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人民出版社,第443页。

④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16页。

⑤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373页。

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1073.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1073.htm)),2001年5月25日。

⑦江泽民,1999:《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 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人民日报》7月21日第1版。

⑧胡锦涛,2016:《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567-568页。

⑨《胡锦涛致亚洲政党扶贫专题会议的贺辞》,载于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ldhd/2010-07/17/content\\_1656925.htm](http://www.gov.cn/ldhd/2010-07/17/content_1656925.htm)),2010年7月17日。

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贫困老乡能不能脱贫”<sup>①</sup>,强调“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sup>②</sup>,“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sup>③</sup>。为打赢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强调要“看真贫”,要“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sup>④</sup>。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四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实践和深邃思考,创造性地提出并推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要求“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sup>⑤</sup>,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要求做到“六个精准”。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必须抓紧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强调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时代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既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行动指南,又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

### (三)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探索实践

在一百多年来的探索实践中,党和政府始终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指导下,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在保证贫困治理稳定性和减贫政策持续性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减贫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循序渐进、持续努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阶级、各政党轮番登台,尝试实行了君主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等,但都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改变近代中国的苦难历史。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开辟新的救国救民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初心和使命,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中国发展与出路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为使农民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通过消除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使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被推翻,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

①习近平,2022:《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7页。

②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第21期。

③习近平,2022:《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3页。

④习近平,2021:《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月26日第2版。

⑤习近平,2021:《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月26日第2版。

华人民共和国,为摆脱贫穷落后状况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摆脱一穷二白的困难局面,党和政府团结带领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将所有从地主手中没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探索建立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五保”制度<sup>①</sup>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体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组织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除了造成农民贫困的主要制度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大规模的农村贫困问题,党和政府实施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通过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启动实施“三西”<sup>②</sup>农业建设、“以工代赈”政策等方式,利用专项资金支持部分极端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老、少、边、穷”地区实行资金扶持政策,减轻税收负担和组织发达地区及城市开展对口支援。实施以县为单位的扶贫瞄准机制,对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施重点扶贫开发。1986年5月,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12月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负责领导、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扶贫开发工作,为实施农村扶贫开发方略提供了组织保障。

20世纪90年代,国家推动扶贫开发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农村贫困问题明显缓解,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但是,这一时期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且多为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解决这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难度更大,扶贫开发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1994年4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按照“四进七出”<sup>③</sup>原则,国家对过去确定的331个国定贫困县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国定贫困县增加至592个,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全国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了更加明确的扶贫到户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制定扶贫方针、划定重点扶贫区域和贫困县,开展“项目式扶贫”并推出多种专项扶贫资金,推动扶贫方式由区域性扶贫向横纵联合、内外兼顾的参与式扶贫转变。

2001年6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继续向纵深推进,反贫困进程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国家调整扶贫工作重点与瞄准对象,

①“五保”指的是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

②“三西”指甘肃省河西地区、定西地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

③“四进七出”指的是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列入国家贫困县,超过700元的县退出贫困县行列。

将中西部地区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积极开展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扶贫,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取消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根据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及时调整贫困标准,将扶贫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上。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了到2020年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统筹谋划,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创新扶贫理念思路和体制机制,明确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确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和主要路径。2016年12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2018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将脱贫攻坚的重点聚焦最困难脱贫群体,要求转变扶贫方式,实现从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向坚持开发式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转变。2020年,为有力应对疫情和特大洪涝灾情带来的影响,党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积极应对困难与挑战,防止发生返贫、致贫问题,确保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完成后,《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先后印发,对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和安排,聚焦重点人群、持续增收、重点区域、工作落实和系统建设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再上新台阶。

#### (四) 中国的减贫成就和世界意义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脱贫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从减贫规模看,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有8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减贫进程看,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摆脱大规模的贫困且绝对贫困仍未彻底消除,中国仅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走在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从减贫质量看,中国对脱贫质量的要求和措施贯穿始终,通过严格脱贫标准和程序,强化扶贫监督和考核,开展第三方评估和脱贫攻坚普查,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确保脱贫质量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一些西方大国掀起

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推卸全球治理责任之时,中国在消除自身贫困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推动建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南南合作等,通过提供项目资金支持、债务减免、技术扩散、智库交流等方式,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开展抗疫合作,建立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在减贫、粮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这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为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中国方案。

#### 四、结语

在系统梳理两百多年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贫困理论及其减贫实践、回顾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及其减贫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与世界反贫困实践经验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反贫困道路上存在明显差异,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不同的反贫困模式。

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减贫进程看,“以资本为中心”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实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减贫进程停滞不前。资产阶级立足“非历史”的观点审视世界贫困问题,从市场逻辑的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掩盖了当代资本掠夺与贫困积累的实质(刘海军,2021)。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第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忽视了穷人的利益诉求。早期反贫困思想和主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救济政策,但其本质仍然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贫困救济只是资产阶级“唯利主义”的伪装外壳,提出的各种反贫困政策实践未能反映穷人的利益诉求。第三,政党轮替使得减贫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足。不同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等存在一定差异,使得减贫政策的执行很难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各“选举型政党”为了获取选票,在选举前以提高民众福利为口号,把减贫政策视为民主选举的政治工具,但结果往往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承诺无法兑现。第四,资产阶级政党缺乏思想引领,减贫行动的号召力、执行力不足。资产阶级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将“个人价值”与“普世价值”、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等同起来,致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虚伪性和欺骗性,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思想引领,减贫行动号召力不足。第五,执政党和政府减贫工作落实和监督机制缺失,削弱了减贫政策的整体效能。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既能通过促进医疗卫生、教育和经济发展降低人们的生存风险,也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剥削劳动力和贪污腐败等增加贫困人口的负担(博杜安,2015)。由于缺乏减贫工作的落实和监督机制,政府的不当行为可能加剧贫困的发生,并在客观上破坏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证明,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是富裕与贫困并存、增长与危机交替的制度性根源。

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减贫理论和实践看,“以资本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和政策实践使得系统性的贫困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了“遭遇发展”的陷阱。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减贫道路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理论和政策实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贫困问题本质上是对人民的根本态度问题,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中国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二是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民之贫富,国之责任”。党和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作为定国安邦的重要任务,加强党对扶贫脱贫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要求五级书记抓扶贫,为扶贫脱贫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三是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消除贫困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证。中国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构建起专项、行业、社会等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凝聚扶贫脱贫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四是充分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不断增强其参与发展、自主发展能力,实行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使贫困群众既有脱贫致富的想法,又有脱贫致富的办法,引导其依靠自身劳动增加收入、摆脱贫困。五是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扶贫减贫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面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通过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创新社会帮扶方式,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的减贫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证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反贫困行动,对实现持续稳定减贫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 参考文献:

- 1.阿玛蒂亚·森,2001:《贫困与饥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 2.陈岱孙,2014:《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商务印书馆。
- 3.陈济冬、曹玉瑾、张也驰,2020:《在持续稳定增长中减贫:我国的减贫历程与经验启示》,《改革》第6期。
- 4.高帅、史婵、唐建军,2020:《基于增能赋权视角的农户贫困脆弱性缓解研究——以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 5.黄承伟、刘欣、周晶,2017:《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评述》,广西人民出版社。
- 6.杰里米·边沁,2009:《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 7.李晓红,2015:《减贫进程中贫困人口能力形成的产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8.李雨、王全忠、周宏,2019:《产业帮扶对农户脱贫及减贫效果稳定性的影响——来自贵州毕节烟草种植计划调减的经验证据》,《经济地理》第8期。
- 9.刘海军,2021:《中国共产党农村治贫的百年探索:演进、经验与世界意义》,《求实》第2期。
- 10.吕洪业,2014:《中国古代慈善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1.马丁·拉瓦雷,2021:《贫困经济学:历史、测度和政策》,中译本,中国商务出版社。
- 12.欧内斯特·曼德尔,1998:《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 13.彭澎、徐志刚,2021:《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农户的脆弱性吗?》,《经济评论》第1期。
- 14.让·雅克·卢梭,1962:《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 15.任东景,2021:《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
- 16.萨米尔·阿明,2008:《世界规模的积累》,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7.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2010:《分配正义简史》,中译本,译林出版社。
- 18.史蒂芬·M.博杜安,2015:《世界历史上的贫困》,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 19.唐正东,2021:《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反贫困思想与中国的脱贫攻坚实践》,《哲学研究》第7期。
- 20.涂圣伟,2020:《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政策导向与战略重点》,《改革》第9期。
- 21.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2008:《人口论》,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2.托马斯·潘恩,2013:《常识》,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
- 23.威廉·配第,2011:《赋税论》,中译本,武汉大学出版社。
- 24.文雁兵、郭瑞、史晋川,2020:《用贤则理: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百强县和贫困县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3期。
- 25.西奥多·W.舒尔茨,1987:《改造传统农业》,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 26.亚当·斯密,2016:《国富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7.杨灿明,2021:《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第11期。
- 28.郑继承,2020:《批判与建构:马克思贫困理论的逻辑理路与辩证图景》,《社会主义研究》第6期。
- 29.Boesche, R. 2002. *The First Great Political Realist: Kautilya and His Arthashastr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 30.Deaton, A. 2003. "Health,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1): 113-158.

##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nti-poverty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Song Hongyuan<sup>1</sup> and Jiang Fan<sup>2</sup>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ural Vitaliz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 Nation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s great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f extremel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overty reduction. Us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anti-poverty theory an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practice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and summariz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poverty reduction policy practice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It shows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social system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other aspects, there is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China and world's major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ir anti-poverty path, forming the "capital-centered" and the "people-centered" anti-poverty model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ects of the "capital-centered" anti-poverty concept and policy practice,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and role of the "people-centered" anti-poverty concept and action on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stable poverty reduction. It also summarizes and refines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provide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for the worl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Keywords:** Capital-centered, People-centered, Anti-poverty Practical Experience, Anti-poverty Theory

**JEL Classification:** O18

(责任编辑:彭爽)